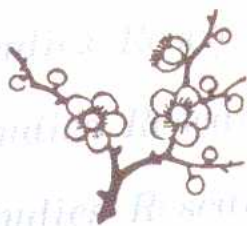


TRANSLATION STUDIES RESEARCH SERIES

Translation · Literature · Culture

翻译·文学·文化

孔慧怡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翻译研究论丛(2)

翻译·文学·文化

Translation · Literature · Culture

by Eva Hung

孔慧怡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1999-190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文学·文化/孔慧怡著.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8
(翻译研究论丛)

ISBN 7-301-04212-4

I. 翻… II. 孔… III. 翻译-研究 IV. H059

书 名: 翻译·文学·文化

著作责任者: 孔慧怡

责任编辑: 张 冰

标准书号: ISBN 7-301-04212-4/H·0458

电子信箱: zpup @ pup. pku. edu. cn

排 版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57 千字

1999 年 8 月第一版 1999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总 序

在人类文明史上,有不少进展都是源于外来知识的冲击,令社会、文化和知识系统产生巨大变化,终于使整个文化系统面貌一新。由于知识的传递主要依赖语言为工具,外来的知识明显地牵涉到外语,所以翻译一直是传播外来知识的重要渠道。我们甚至可以说,世界上各主要文化系统的发展都和翻译活动脱离不了关系。

公元8世纪,伊斯兰教阿拉伯国家大量翻译古希腊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文献,同时也引进源于印度的知识,在很短的时间内,阿拉伯文化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8世纪到13世纪这几百年里,阿拉伯世界在数学、医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执全球科学文明的牛耳;同时,伊斯兰教在教义和理论方面,也因为受到古希腊学术的冲击,而建立起更完备的体系和规条。

公元12世纪,欧洲以西班牙、北意大利等地为中心,大量翻译阿拉伯学者的著作,并且通过阿拉伯文的译本,重新认识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思想。这些在欧洲早已成为绝学的文献,从阿拉伯文再翻译成拉丁文,直接带动中世纪欧洲文明的重大革新。假如我们说,西方现代文明的缘起,就在于这一次基于翻译和重译的文化承传,也决不是夸大之言。

以上两个例子,正好说明翻译活动可以产生多么巨大的促进文化发展的力量。但是假如我们再思考阿拉伯文明和欧洲文明在这段时间之后的发展路向,我们会发现它们虽然都以古希腊学术成果为基础,后来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为什么同样的文献以翻译的方式介绍到两个地区,到最后会演变出截然不同的后果呢?既然外来知识是完全相同的,那么最终的分别肯定是在于阿拉伯和欧洲文化环境的差异了。因此,这两个例子也告诉我们:翻译所造成的长远文化影响并不取决于原著或译作本身,而是取决于当时的文化环境会把外来知识引上什么道路。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也有过和上述阿拉伯和欧洲类似的经验,通过翻译引进外来知识,达到文化上的飞跃发展和重大革新,其中最触目的例子,莫过于历时超过10个世纪的佛经翻译运动。始于公元2世纪中叶而大盛于公元4至8世纪的佛经翻译运动,可以说对中国文化的每一个层面都造成深远影响。中国的语言、文学、民间艺术、本土信仰、宗教组织、社会风尚等方面,都因为佛学通过翻译在中国传播而有了新的发展;更值得注意的是,源于本土的哲学思想在佛经翻译的高潮已经过去之后,因为得到佛学思想的启示,完成了极富历史意义的自我更新——宋明理学就是这个过程的产物。

同样,明末清初欧洲耶稣会教士到中国传教,他们通过翻译引进中国的天文、地理和自然科学知识,不但在当时的先进士大夫群中造成影响,也间接对清末力求国家自强革新的知识分子起了启发作用——通过翻译而得以传播的外来知识,在朝廷禁教之后,并没有完全烟消云散。从历史和文

化意义来看,清末改革派希望从“西学”入手,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可以说与明末士大夫对“西学”或“天学”的探讨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翻译传统源远流长,我们可以列举更多的例子,证明翻译活动引起的主体文化(host culture)反响是深远而又持久的;但中国本土文化所提供的环境,在上述不同的翻译活跃期,到底如何有选择性地把外来知识引上某些轨道,也许更值得我们关注,因为这样的研究才会充分显示翻译活动作为跨文化沟通的枢纽,其可能性和局限性在于什么地方。综合上面所列举的种种情况,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要从事深入的翻译研究,应该考虑两大范畴:第一是主体文化的规范和环境,第二是翻译活动与主体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产生的相互影响。

过去中国的翻译研究,一直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要任务,很少涉及翻译活动如何在主体文化里面运作的问题。在这样的研究范畴之内,从事研究的人很难脱离“原文”观念的限制,也因此绝少触及翻译活动所能产生的庞大文化力量,以及翻译活动和主体文化之间的互动作用。但正如上文提到,翻译是否能造成文化影响,又或是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其实并不在于语言转换的过程,而完全视其主体文化如何制约,又如何接受这个过程的产物,所以如果我们把眼光局限于文本或翻译机制,而漠视主体文化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面对中国翻译传统如此丰富的材料,实在让人有入宝山而空手回的感叹。

翻译研究作为一个新学科,在 70 年代就已经开始文化

层面的探索；但我们对中国翻译传统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仍未达到真正突破性的发展。这套《翻译研究论丛》的着眼点，正是从主体文化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翻译传统，希望通过分析前人的经验，对翻译活动的文化意义达到更深入的了解。

孔慧怡

1998年2月于香港

鸣 谢

本书第一和第二部分收录的大部分论文,初稿在 1992 年至 1998 年间曾分别在香港、中国大陆、美国、丹麦、英国、日本等地的学报发表,但收进这个集子前,都做了相当大程度的修订和增删。修改论文期间,得到我的研究助理黎铭贤、殷嘉慧、黄美琼和秘书周绮华协助翻查资料、文字处理及校对工作。

第三部分“伪译专论”,在收集材料时得到很多朋友的帮忙,才可以在两年内完成。这些朋友包括在台北的王文颜教授,在纽约的 Janet Ng,在北京的王东风和当时还在澳洲的 Jennifer Eagleton 及 Simon Patton;又蒙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中文部主任 Frances Wood 安排,得以读到《景善日记》的所谓原文。此外,也要感谢 David Pollard 和王晓明就《佛教疑、伪经》一文的初稿提出宝贵意见。

“伪译专论”所收的文章,是我近年两个研究项目的部分成果。这两个项目分别是“Fake Translations as a Cultural Phenomenon”(AL96021)和“Translation in China-an Analytical Study”(CUHK181/96H),前者是香港研究资助局中文大学拨款项目,后者是香港研究资助局指定拨款项目。至于第

一部分有关晚清翻译的文章,则是“Translation in China”项目和另一香港研究资助局指定拨款项目“The Self - Reflecting Mirror” (CUHK93/104)的部分成果。“伪译专论”写作期间,蒙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 Bellagio Residency,让我得到近五年来惟一可以专心写论文的一段时间。

孔慧怡

中国翻译研究的几个问题

(代序)

译界的实况

一般人认为翻译工作是双语活动,理解深一点的人则会说这是双文化活动,这当然都可以说是正确的看法。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翻译活动从选材到译作进入主体文化的整个过程,就会发现不管是“双语”还是“双文化”,都只是比较粗略的观念。就“双语”而言,译者需要对原语和译入语有很好的掌握,才可以从事翻译。这个观念虽然在佛经翻译运动中已由彦琮提出,但在中国翻译活动中成为主流现象,却属于相当后期的发展,而且时至今日,从实践来看,仍然是并非人人能达到的理想境界。因为客观环境的限制,很多人仍然在学习外语的阶段,就已经在做翻译;也有很多长时间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对自己的外语程度并不真正了解。总的来说,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对两种语言的掌握并不平均,是很常见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常规现象。

在每一个文化体系里,外语知识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中国文化体系的传统发展除了关键性的危机时期之外,一向强调内部协调、不假外求。因此,主流对本文化体系外的东西不但很少表示兴趣,甚至还可能抱着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予以排斥;中国历代正史对外来事物的选录和展示

方式,正好说明这一点。有了这样的背景,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外语和外国文化知识在中国并不普及,而这个情况,一直到了20世纪才起了一点变化。

既然懂外语的是极少数,他们在这方面的知识和本文化体系的一般水平相比,就会显得非常出众了。但到底个别译者的外语和外国文化能力是否真的足以应付翻译的需要呢?他们又是否有足够的宏观知识,去领会翻译所触及的本土文化规范呢?这还是个问题。因为有这些不明朗因素,传统的翻译研究专注于探索翻译机制、寻求翻译策略等积极建立规范的活动,我们可以理解为:希望通过种种在语言层次的努力,弥补和加强在理解和表达两方面的能力不足之处。

翻译活动的各个阶段

这样的积极活动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就是让大家的视野集中在很狭窄的范围(即词句或文本之上),而忽略了翻译作为一股需要在主体文化里运作的力量,本身就有它的既成规范。事实上这一股力量的影响,绝对比以语言或文本为依归的翻译机制和策略研究来得深远。很多人在讨论翻译时,谈的只是翻译的语际转换过程,或是这个过程的产品,用的是指导性观点(指导性并不代表客观);假如我们要探讨翻译的文化力量,就必须把这个范围扩大,以描述为基础,把研究扩展到翻译过程开始以前和翻译产品面世以后的各个阶段。这些阶段包括选材、选择译者、出版安排、编辑参与、当代反应和历史地位,而每一个阶段都受当时的社会、文化,甚至经济环境影响。

翻译虽然是跨文化活动,但所涉及的两种文化在上述每一阶段所占的比重都不一样。假如要详细研究两种文化对翻译作品做成的引力,我们当然不能撇开其时代背景及译者(或是翻译策动人)的文化取向,也就是说要同时顾及宏观的文化氛围和微观的个人背景。这样大规模而有系统的探索,不但对研究某一时期的翻译策略和流行翻译方法可以起化零为整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把翻译研究从探讨语言能力这个层次解放出来,成为研究主体文化在演变过程中如何吸纳外来知识的一项主要标志。

但在客观的描述性研究全面展开以前,我们是否就无法讨论翻译活动在各阶段所受的文化引力呢?事实上,即使比较简单和粗略的阶段分析,对于矫正因为聚焦于文本带来的偏差也会有一定帮助。以下的简略分析,针对在一般情况下,翻译活动牵涉的两种文化何者引力较大,对做出更深入和详尽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1. 选材:影响翻译选材的决定,主体文化的倾向占了压倒性的优势。假如对本土文化形势不作出宏观的分析,而纯粹依赖个别译者解释为何翻译某一作品,我们很容易会误以为选材的基础建立在原语文化体系之上。策动翻译的人(可以是译者,也可以是出版商或编者)介绍外来作品时,往往要为它建立权威地位,而说明此作品在原语文化如何重要,是最常用的手法。但这种权威运作方式,其实只有在符合两个条件的情况下,才会成功:第一,是本土文化对这类作品有内在需要;第二,是本土文化认为原语文化的标准可以作为模范。这种主体文化的考虑,不但影响个别作品或作者的译介,更深远地影响着什么种类的作品会得到大量翻译。中国

近 2000 年历史中各翻译运动与翻译大潮的取向,正好说明主体文化的主导力量。

2. 理解:选材之后,进一步就是实际翻译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粗略地分为“理解”和“传递”两个阶段。客观地说,在理解阶段,原语文化应该占极大比重,因为假如译者希望中肯地介绍原作信息,他对原作的理解就一定要立足于原语文化规范之中。但正如上文说到,即使译者本人有这个希望,他的语言和文化能力才是影响这个过程的最大因素。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排除时代和文化氛围对个别译者的影响:译者体会到本土文化的特殊需要,在理解原作时,可能有刻意的偏差,也可能受到潜意识的影响。因此,客观地说,即使是理解原文的过程,本土文化的拉力仍然要比一般人想像中来得强烈。

3. 信息传递:信息传递的阶段,应该是两种文化的力量在各个层面都同时运作的时候,也是译者最自觉地进行文化协商的阶段。到底哪一种文化的拉力占上风,很大程度取决于译者自觉或不自觉的文化定位。一般针对所谓“意译”或“直译”的讨论,其实研究的重心就是在信息传递这个阶段中,译者作出的方向性决定。假设译者的语言和文化能力足以完全控制翻译时种种技巧上的问题,他的翻译方向和方法就会显示他的个人文化取向了。可能性不外三种:第一,是在语言的形式和文化规范两方面都倾向原语文化;第二,是争取在原语文化和主体文化之间建立一定程度的平衡;第三,是在语言和文化规范两方面都倾向于主体文化。译者所做的决定,很大程度受到两种因素影响:除了其个人意识形态和语感及文化背景外,我们也要考虑翻译时期的社会文化

氛围。从这个角度来看,主体文化作为一个大环境,在信息传递阶段仍然起了很大的直接和间接力量。

4. 当代评价:翻译作品面世前后,得到什么评价和反响,就完全视当时主体文化的内部需求和规范而决定了。当然,很多时候译者或评家会标榜原作在其本国的地位,乍看似乎是把权威基础建立于原语文化,但事实上这种情况每每出现于主体文化刻意大规模学习外来知识的历史时期;又或是主体文化虽然基本上自信心极强,但同时在某些特殊方面希望借鉴外来知识,因此在最基础的层次来看,主体文化的取向仍然发挥关键性作用。我们都知道,译者和译作的当代名气及影响力,并不一定和作品的水准成正比,因为能配合翻译时期主体文化需求的选材、翻译方法和表达风格,很容易找到稳当的立足点;反之,其文化影响力就相当有限了。

5. 历史地位:主体文化的潮流和规范会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改变,因此后代对过往各历史时期的翻译活动和译作,也会以现行规范来评价。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本身的议程,假如这个议程和过往的有很大分别,那么过去曾经造成极大影响的翻译活动,在新的历史时期就会失去其迫切性和深层意义了。这就是为什么佛经翻译运动和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似乎完全没有引起大家作出深入研究的兴趣——从20世纪初开始发展起来的中国翻译规范,可以说是对宏观历史性的翻译研究构成了一重障碍(这一点下文继续讨论)。这种现象当然并不限于中国,而它产生的影响,可以见于三方面。第一,是过往的译作完全被遗忘,没有人再提及(例如

构起似乎是宏观,但实际上完全空泛——甚至错误——的一种论述(例如今人谈及佛经翻译);第三,是否定过往的评价,按照当前文化规范,挑选个别作品,甚至是个别时期的翻译活动,重新评价,目的是反映主体文化当前发展的方向(例如五四运动后对清末小说翻译的评论)。上面所说的三种情况,基本上是互相排斥的,哪一种成为主流,就要看当前文化潮流和相关的历史时期文化规范关系是否和谐了。如果遇上主体文化规范突变,而变化又属于反叛性的,则两个相连的历史时期会有敌对性的文化规范,而这亦会反映在后者对前一时期翻译活动的评价之上;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一段长时间里,清末民初翻译运动所受到的冷遇。

译者和论者的文化定位

上文提到,由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特点,再加上近数十年政治形势和意识形态造成的巨大影响,中国人的外语及外国文化知识一般水平并不高,因此相对而言,学习外语专业的人在这方面的能力就显得很强了。外语专业的背景,也让他们认为自己的知识和见解建基于外国文化;超出本土文化常规水平的语言能力,成了他们引用外来知识和权威的有力工具,因此不论译者本人,或是主体文化内的其他人,都会把译者的定位与外来文化连接在一起。至于从事翻译研究的人,基本上与译者的背景相近,所以文化定位亦非常相似——事实上有很多论者本人就是译者。

是否所有从事翻译的人,都有双文化能力呢?这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问题。在某一些社会或社区,由于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的关系,很多人都会在日常生活上接触到超过一种文化,也会使用超过一种语言;国家如瑞士和新加坡,政治区域如加拿大的法语省分,社区群体如加州大量墨西哥人聚居的地方,都有这种现象。中国的情况很不一样,两千多年来虽然异语但同文,文化上一向相当统一,人民接触外语和外来文化的机会并不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由于意识形态的问题,外语专业带有相当程度的政治敏感性,这直接影响到教授外语的方针和方法。国家对外语人才有实际的需要,但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又不愿意让国民接受外国文化的熏陶,因此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做法,就是学语言而不学文化。

初级英语教科书中“Is this a house? No, this is a horse.”这类句子,充分显示希望在文化真空中教授语言的各种努力;而比较高级的外语课本,经常出现 Chairman、the Party 等字眼,更明显地体现要以现行本土规范作为外语教学根基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学习与外国有关的知识,有如瞎子摸象,其困难不言而喻。这样的训练方式与文化背景培养出来的人,如果需要运用外语向外国人表达主体文化的现行规矩与楷模,面对的是语言能力和文化楷模的问题。反过来说,如果要求他们以本土语言详尽地传达外来文化的规范,问题也同样大,因为外来文化可能只是凭着摸索而建构出来的“象”。另一个同类的教学问题,就是使用在文化上已经过时的外语教学材料,又或是依赖一两个世纪以前的文学经典名